

## 编者按：

上世纪80年代，由张领先生主持考古发掘、整理编撰的《侯马盟书》出版，对于研究中国春秋时期的历史、政治、文化具有填补空白的文献价值，是新中国考古史上的一项重大贡献，得到了学术界的高度评价。

张领先生出身寒素，靠自学成材，学识渊博、著作颇丰。主要论著有《侯马盟书》、《古币文编》、《张领学术文集》、《张领学术论集》等，其研究把考古学、古文字学、历史学融为一体，受到郭沫若及许多学术大家的由衷赞许。

11月23日，是张领先生九十寿辰，众多学术界大家撰文祝贺，经冯其庸先生介绍赐稿本报，兹特辟专栏刊发，以向这位在考古和古文字研究领域取得重大成就的仁智长者致敬。

## 贺张领先生 九秩荣庆

冯其庸（中国文字博物馆馆长）

九十年华古春，一编侯马世人惊。  
天书解破千年事，亘古公推第一人。

老翁九十即仙翁，夜读天文万象通。  
看到嵩阳千岁柏，祝公来日更葱茏。

## 敬贺张领先生 九十华诞

宿白（北京大学教授、著名考古学家）

张领先生是山西文物考古工作的老前辈，他治学严谨，待人宽厚，在考古和古文字研究工作上取得了很大的成绩，特别是对《侯马盟书》的整理研究更令人瞩目。

恭祝张领先生健康长寿！

## 一段深刻而美好的记忆

石兴邦（著名考古学家）

11月23日是张领同志的九十大寿，闻讯之余，欣喜万分。在这里我谨和我的家人，向张领同志和家人致敬！

我们是同龄人，有着同样的历史际遇。从上世纪50年代起，时代和机遇把我们安排在一起，使我和他在山西侯马等地一起工作并度过一段愉快而宝贵的光阴。我们又是同道、同行、同业，亲何如之，幸何如之！感光阴之过隙，念人生之须臾，转瞬间已经半个世纪过去了，想起我们在一起度过的那些日日夜夜及其相联系的往事，特别是我们事业开创时期，那种兴奋和喜悦，还有我们取得成果的那种庆幸和愉快。

自上世纪50年代侯马大会战后到下川发掘的20多年内，我有机会到山西工作和学习，与张领在一起谈论有关事业和工作的问题。我们有共同的情愫，能够愉快地谈到一起。他由革命工作转到文物历史研究工作，我由研究民族学而转到文物考古工作，我们殊途同归而定于一，一心为祖国的文物考古事业奋斗终身而鞠躬尽瘁。

在我和他相处期间，觉得他是富有开创性、具有战略思维的人。在我们探讨问题时，他往往背着手，挺腰迈步，侃侃而谈，显出一股英风豪气，给我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记忆。以下几件事例，可以体现出他的人格力量。

（一）他成功而有成效地组织完成了发掘侯马晋国遗址的3次大会战。新中国成立伊始，经过3年恢复时期，从1954年起即开始宏伟蓝图建设的第一个

五年计划，因国际形势的变化，国家将这些建设工程大部分安排在内地，西安、洛阳和侯马都有，多为军工和基本工业建设项目，而这3个城市都是古都名城，历史文化遗存特别多，国家要求要重视文物保护和发掘研究工作。

张领动员地方力量，对晋国遗存做了全方位的调查和了解，得到了中央的支持和批准，经过1954年和1955年的勘探发掘，组织了3次发掘大会战，参加工作者前后达200余人。在各方面的大力支持和配合下，发掘工作取得了圆满胜利。使晋国新田的规模和遗存面世，使晋国遗址辉煌于世，发现了古城、祭坛、盟誓遗址和盟书祭祀遗存和墓葬，以及大量石、玉、铜制的文物品等，并在全国配合基础建设的考古发掘中树立了一面成功而辉煌的旗帜。

（二）晋国遗存面世，张领组织力量，整理研究所发掘的历史文物遗存，投身于盟书的研究。他是一个学术型的人，学术思维十分缜密。他对《侯马盟书》的研究，是有划时代意义的。盟书面世后，文史界的前辈郭沫若、唐兰、陈梦家等都有研究的专论发表，但无论深度还是广度，都不如张领论述得深刻而周严。这是光辉的学术贡献，也为后学者如何进行科学研究树立了很好的典范。

（三）张领在侯马晋国遗址发掘富有成效的基础上，利用发现的资料，结合历史文献，进行晋文化的整合研究并组织“晋文化研究会”，专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。从1985年到1986年连续召开了两次晋文化学术研讨会。这种历史和考古结合研究

上世纪70年代中期，沁水下川一带发现了丰富的细石器文化遗存，这是考古界求之不得的从旧石器到新石器的过渡遗存。它与农业起源文明发展有重要关系（称谓中石器时代遗存），引起考古界的极大重视。山西文物工作委员会和北京考古所研究决定，两家组织联合考古队共同开发研究这一重大学术问题。工作从1976年5月开始，一直到1978年结束，取得了丰硕的成果。

# 大家张领



张领，1920年生，山西介休人，著名古文字学家、考古学家、历史学家。幼家贫，未生丧父，9岁丧母。童年入学，仅及高小。博闻强记，酷爱文史、金石书画。青年时，热爱文艺，积极抗战。新中国成立后一直致力于古文字研究、考古发掘及晋国史、古天文学研究等。曾任山西省文物局副局长兼考古研究所所长、名誉所长，先后担任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理事、中国考古学会理事、中国钱币学会理事兼学术委员、山西省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等职。主要论著有《侯马盟书》、《古币文编》、《张领学术文集》、《张领学术论集》等，其研究把考古学、古文字学、历史学融为一体，在国际学术界产生重大影响。张领在诗文、书画、篆刻等方面造诣颇深，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声誉。

薛国喜同志从山西打电话来，要我为张领先生九十大寿写几句，深感荣幸。我比张领年小许多，但相识并向他请教已有30余年，国喜的电话，使我一下子回忆到“文革”的岁月。

1972年，在周总理的关怀下，文物考古工作开始恢复生机，正好这年有临沂银雀山汉简发现，随后又有长沙马王堆帛书、云梦睡虎地秦简等等，于是在国家文物局领导下成立了整理小组，先后有罗福颐、顾铁符、唐兰、张政烺、朱德熙、于豪亮、裘锡圭等诸位学者参加，“文革”以前，我早知张领大

名，无缘见面。给我印象最深的是，他在《文物》1966年第2期发表的《侯马东周遗址发现晋国朱文书字》，即关于《侯马盟书》发现的报道。由于性质重要，郭沫若专门为之撰写了《侯马盟书试探》论文，一

社的整理小组的时候，我和各位同仁都非常高兴。1976年印行的这部大型报告，对考古学、历史学和古文字学都有很大的贡献。

后来我逐渐了解到，在“文革”浩劫之中，张领怎样历尽折

## 仁者寿

李学勤（著名学者、清华大学教授）

起刊出。我读到后兴奋不已，可是当时环境已经是山雨欲来，容不得思考这类问题，就连《文物》月刊出到第5期，也和所有学术期刊一样被迫中断了。

因此，当1975年张领到老北大红楼的文物出版社，准备出版《侯马盟书》报告，顺访也在该出版

磨苦难，真是令人心酸，然而他自己谈及，总是温柔敦厚而且以幽默的语气出之。我与他长期交往，谈吐间从未听到他对任何人或任何事有过当词。这应该就是古人讲的“仁”道吧。常语说“仁者寿”，在张领身上得到了验证。

《侯马盟书》是首次成批发现春秋晚期晋人的手书文字，盟书内容的体例格式也是前所未知，所以张领的研究是富于开创性的。正如《侯马盟书》刊行后，学术界引起了热烈的讨论，对盟书的历史性质和背景、文字隶写和考释，都有所进益。特别是盟书的具体年代，争论较多，我个人一直认为张领的主张，即盟书反映赵简子事是正确的。1998年，我写了题为《侯马、温县盟书与周代学札记》，叙述陋见，也是向张先生请教，并支持他的论点。

上次我到太原，拜见张领先生，他精神矍铄，健谈如昔，对学科发展极为关注，我认为这是学术界的幸事。谨借报上一隅之地，向张领先生荣寿表示祝贺。

## 记张领先生一二事

裘锡圭（著名学者、复旦大学教授）

张领先生是我们古文字学界的老人。欣逢先生九十大庆，敬撰小文祝贺。

先生早年就参加革命工作，新中国成立后曾担任山西省文物、考古工作领导职务，在山西文化事业上卓有建树。先生的学术兴趣集中在古文字研究上，造诣很深。

先生所著的《古币文编》，1986年由中华书局出版。此书体例严谨，内容翔实，全面反映了先秦货币文字研究在当时所达到的水平，是古文字研究者必备的参考书。先生对《侯马盟书》长期不懈的整理、研究之功，更为学界所称道。他在《侯马盟书》（旧版）出书已有两年，此书定价40元，而我的工资每月只有六七十元，实在无力购置。先生了解到这个情况，会后很快寄了一部《侯马盟书》给我，还在扉页上以优美的书法题了赠词。这真是雪中送炭，令我十分感激。前不久，跟先生通了次电话，觉得先生精神很好，感到十分高兴。敬祝先生身体健康，寿比南山。

应该是这个时期的遗物”（《张领学术文集》，中华书局，1995年，140页）。这一推论还可以扩展到风格类似的其他官印。这就为古印学、古文字学提出了一个新的课题。

张先生学问好，为人也好。我是1978年年尾在吉林大学召开的中国古文字学术讨论会上认识先生的。那时，先生即将步入耳顺之年，我按虚岁算是44岁，这个年龄在目前的古文字界当然不算年轻，但是在当时我却属于最年轻的一辈。张先生平易近人、和蔼可亲，跟我们这些晚辈也相处得很融洽。那时，《侯马盟书》（旧版）出书已有两年，此书定价40元，而我的工资每月只有六七十元，实在无力购置。先生了解到这个情况，会后很快寄了一部《侯马盟书》给我，还在扉页上以优美的书法题了赠词。这真是雪中送炭，令我十分感激。前不久，跟先生通了次电话，觉得先生精神很好，感到十分高兴。敬祝先生身体健康，寿比南山。

## 作庐先生临摹的望山简小记

张光裕（著名学者、香港中文大学教授）

看来我这辈子和竹简的确有着深厚的情缘。上博战国竹书、清华战国竹简和岳麓书院秦简，我都有关节。但第一次接触竹简，还得从作庐先生临摹的望山简说起。

已经是20多年前的事，但至今还记忆犹新。当时我刚从澳大利亚回国，应聘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国语言及文学系担任教员，因为外访开会，有机会在山西太原拜访张领先生，张领热情地请我到他家里做客。书桌上正摆着用绳子编好的几枚竹简，是张领先生临摹望山简的仿制品，但是古意盎然，制作精美。一瞬间，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，于是便不假思索，很天真地恳请先生也替我仿制一枚，以作教学之用。

过了不到一年，陶正刚先生因事访港，同时也捎来几枚竹简，说是张领先生送给我的。把长长的封包打开一看，倒让我大吃一惊，那不就是原来在先生家里看到的那几枚竹简吗？先生还特意用牛皮纸粘制了一个长形封套，把4枚长65

厘米的仿制竹简妥加保护，封套左侧外书“湖北江陵望山第一、二号战国楚墓遣册竹简仿制品四简，张领于太原”。原简多年后，早已泛黄，然简文描摹逼真，契口编绳更是用心系联，每一简背上端皆贴有红签，其一墨书“望山一号墓竹简摹本共二口24”；另外3枚，亦分别写上“望山一号25”“望山二号27”“望山二号4”。又以塑料套及白纸裹包仰湖一号简（长24厘米）及隶书汉简（长22.5厘米）仿品各一枚，一并附赠。陶先生说，张领先生近年已没有太多精力重新替我制简了，因此便把原来只有6枚精致的作品，抽出4枚，只留下两枚自用。当时手捧竹简，内心的激动和感动，真是难以形容。其后多年的教学生涯里，每逢古文字课，我都不忘把它拿出来让学生观摩欣赏，并述说张领先生扶掖后学和嘉惠学子的热诚。

作庐先生的道德文章，大家都尊崇有加，毋庸我赘言。谨藉此短文，用贺寿，祈颂介福康宁，并识不忘。

## 相关链接

### 《侯马盟书》 发掘出版始末



盟书残片

1965年冬，山西侯马电厂在搞基建，挖土方时发现了不少写有古代文字的石片、玉片，在原平县搞四清工作的张领闻讯立即赶往考察。这些石片、玉片上的字迹非常小，需要在放大镜下才能勉强看清。而即便是在放大镜下，这些如天书般的石片文字还是令人一筹莫展，当时没有一个人可以辨认。张领经过细心整理、反复琢磨，最终认定，“这一定是很重要的东西，虽然究竟是什么还说不出来。但有些字句好像是什么祭祀，跟祭祀有关系”。根据这个判断，张领写了一篇文章《侯马东周遗址发现晋国朱书的文字》，发表在当年的《文物》杂志上。这篇文章的发表，在当时乏善可陈的考古界引起了巨大轰动。当时，知名学者王治秋将此文拿给了郭沫若看，郭沫若看了以后，很快写了一篇文章《侯马盟书试探》。文章认为，这些文字是先秦的盟书。应该说，郭沫若的文章对张领是一个极大的启发，从此，张领根据“盟书”这个思路开

始从历史上进行考证。

到1973年，张领最终把几千件盟书残片的文字全部辨认了出来，并写了一系列的考证文章。这样，考古学及古文字学的巨著——《侯马盟书》随之诞生。在上世纪80年代，张领考古发掘、整理编撰的《侯马盟书》被考古学界评为当代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。考古学界公认，《侯马盟书》对于研究中国春秋时期的历史、政治、文化具有重大意义。80年代，日本考古界也专门给张领先生发来贺信，盛赞这一重大考古成就，并诚邀张领赴日讲学交流。

张领的这项研究刚刚开始不久，“文革”就开始了。“文革”期间，张领有一段时间基本上每天的工作就是打扫院子。张领回忆说，当时他负责整个文物局机关的厕所卫生，男女厕所都是他来打扫。张领不无自豪地说，他原来是考古所的所长，后来又打扫厕所，“文革”后再恢复为所长，因此许多同志笑称他为“老所长”。张领在“文革”期间被关牛棚长达7年，研究盟书的事不得不中断。“文革”中所有的《侯马盟书》资料并没有遭到任何毁坏，它们被集中装箱，堆放在文庙后的一间旧房子里，一直默默地等待着张领的到来。而“文革”一结束，张领便再次投入到《侯马盟书》的研究之中。《侯马盟书》的初版发行时间是1976年，当时的印数很少，因而这本书引起的轰动仅限于专家圈子里，广大读者中知之者有限。据当时的媒体报道，甚至在北京大学的图书馆内，也只购藏了一册，使得许多专业教授也难得一借。其后很长一段时间，《侯马盟书》没有再行出版。据了解，目前我国台湾地区有人出版了《侯马盟书》的缩印本。事实上，张领自己对初版发行的《侯马盟书》并不满意，这也是他重修“盟书”的原因。2006年，《侯马盟书》增订本终于由山西省古籍出版社再次出版发行了。张领说，他的夙愿终于了啦。